

# 两岸经济互动与台湾社会认同困境研究

◎王瑜

**摘要:**随着两岸经济互动的增加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台湾社会民众认同的趋同,反而出现在“台湾人”和“中国人”认同比例上的严重分化,这一困境必将并长期制约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本文通过构建社会认同的基本生成机制对社会认同的过程及其构成要素进行深入剖析,并借此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

**关键词:**两岸经济互动;社会认同生成机制;困境分析

**中图分类号:**D6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62(2015)04-0035-05

## 一、引言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的概念是由Tajfel(1982)受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启发而提出的,在区分了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将后者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或她)的情感 and 价值意义”。所以可以说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在内容上社会认同具有多样性,其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经济认同等等,均可视为社会认同的子集;在效能上其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基于此在对社会行为与社会心理的研究中,充分认识社会认同的现况并把握其发展的趋势性对于制定相应的社会发展策略尤为重要。特别

地,在台湾问题的研究中,台湾民众的社会认同问题被给予高度的关注,诸如陈孔立教授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对当前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与“台湾人认同”的关系加以解释<sup>[1]</sup>;孙云等则是利用心理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理论解释当前台湾民众的认同危机的运作机制等。这一问题引发学界高度关注的原因在于台湾民众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国家、民族认同与两岸关系大发展的现状存在较大落差,也成为制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持久性因素<sup>[2]</sup>。2008年以来两岸间的经贸往来日益活跃,签订ECFA、陆客入台、陆资入台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但令人困惑之处在于,这一期间却成为台湾民众家国认同更为极端且更为分化的阶段。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2008年后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比不断增加,至2014年

收稿日期:2015-05-07

作者简介:王瑜,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6月则占样本总数的60.4%，而认为是“中国人”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至2014年6月的3.5%。尚不深究民调样本的代表性，仅其结果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且其与现实中的直观感受也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经济联系的紧密并没有如预期般带来台湾民众社会认同上的逐渐趋同，反而是更大的分化，这也成为两岸经济互动与台湾社会认同关系发展中的一大困境。

在以往文献中对于台湾认同现状的分析多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展开，通常划分为岛内因素、大陆因素以及国际因素三个方面<sup>[9]</sup>。本文欲通过对社会认同生成机制的分析，重新解构台湾民众社会认同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进而对于经济联系和社会认同关系的困境提出合理解释。

## 二、社会认同的生成机制

本文中，社会认同的生成机制可做如下表述：认同主体（主动或者被动）在认同动机的驱动下通过某种途径和方式对被认同的客体进行认知，而这一过程也会受到某些外生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对于客体不同的主观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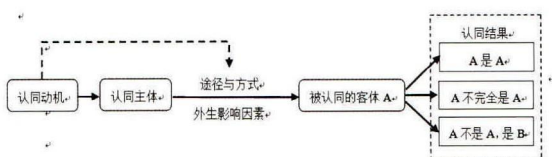


图1：社会认同的生成机制

### （一）认同主体

社会认同理论根植于社会身份论，因而社会认同论者认为：人们会用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群的成员资格（group membership）来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依据社群成员资格来建构的身份被称为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而依据个人的独特素质而建构的身份被称为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在社会认同论中，身份建构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形成“我群”与“他群”的分辨。所不同的是个人身份利用个性将自己辨认出来，而社会身份则是利用群性分隔。基于此可知，社会认同的主体即是行为个体由“自我”到“我群”的演变过程，但其认识行为一方面可能是主动生成，即行为个体主动寻找“自我”的特征加以辨别，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被动的，即行为个体表现出某种倾向进而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而归于某一社群，

无论是主动亦或是被动行为其目的在于借由自己（或他人）在某社群的成员资格把自己（或他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将该社群内的典型成员的特征冠于自己（或他人）身上，让自己（或他人）的特征等同于社群内典型成员的特征。

### （二）认同动机

第一是提高自尊。Tajfel曾提出一个对社会认同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假设：人们建立社会身份，是为了透过所认同的社群提高自尊。从这一假设可以推出三点基本结论：第一，社会认同与社会基本价值、道德和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总是会评价并且比较各个社群的优劣、社会地位和声誉，试图把自己编入较优越的社群，并冠以社群成员良好的特征，以此提高自我归属感。第二，当人们认同的社会身份受到攻击或者威胁时，人们会在思维或者行动上捍卫所属社群的声誉；他们会在思想上肯定该社群成员共有的特征和价值，或以具体行动还击。第三，当弱势社群成员感觉到所属社群在声望和权势上都比不上其他社群时，为了维护自尊，会采用多种应对方法，其中包括模仿强势社群以图自强，辨认一些所属社群比强势社群优胜的地方，或离弃所属社群，是为对认同主体的被动驱动。

第二是降低无常感或提高认知安全感。人们除希望借由社会认同提高自尊外，也希望透过它降低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社会认同让人们对于“我群”和“他群”的特征具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进而懂得如何与“他群”和“他者”交往。所以，社会认同可以降低社会实践中的无常感，给予人们一种社会认知上的安全感。由此可推断出两点结论：第一，并不是所有的社群成员资格均能降低社会实践中的无常感，这一点取决于所属社群的行为规范是否清晰，社群成员的行为是否有共性等等。相对于一些规范模糊、成员混杂的社群中，其成员的社群资格对提高社会认知安全感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当人们需要借由社会认同降低实践中的无常感，提高安全感时，则会更加倾向于规范清晰、成员组成单纯的社群，因而建构完整、组织严密且规模较大的社群更易受到认同主体的青睐。第二，认同规范清晰、成员组成单纯的社群，其内部认同倾向也会有差异。有些人较能

接受或容忍社会实践中的无常感,而有些人只能过着很有秩序和条理的生活。与前者相比,后一类人更倾向认同规范清晰、成员组成单纯的社群。

第三是满足归属感和个性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渴望追求个性的释放,同时也想通过依附群体而获得归属感,满足其归属需求。逻辑上看似两者并不相悖,但当落实到社会认同中则会出现一种紧张的关系。当人们认同一个社群时,会觉得自己属于那个社群。社群的成员越多,便觉得同道的人越多,归属感也越强。可是,在社会认同过程中,又会出现非个人化的情况,即个体将群体的典型特征加诸自己身上,结果再看不出自己与其他社群成员之间的不同,有损个性保存需求,而且所认同的社群成员越多,便和更多的人没有了分别。由此可知:其一,当满足归属感的需求越大(或保存个性的需求越小)时,人们会倾向认同能容纳更多成员的社群,反之亦然。其二,满足归属感的需求和保存个性的需求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当不同环境中的归属感需求和个性保存需求被激发时,相应的认同行为也将随之启动。

### (三)途径与方式

根据经验认同结果分化为三种情况:(1)与客观主体一致;(2)与客观主体部分一致,但有新内容的添加;(3)与客观主体完全不一致。而在认同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方式:类比、认同和比较。类比(categorization)是指认知主体将自己编入某一社群之中,因其所得的认知结果是在某一特定环境中作出的,所以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亦可延伸为通过沟通对不同社群有用的核心特征建立共识;认同(identification)是指认知主体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因此通过此种方式个体行为人可以满足其归属需求,享有社群价值;比较(comparison)是指评价个体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劣、地位和声誉,这种方式也为社会类别间关系的重叠提供了解决的可能。三者逐层递进,通过比较产生对社群的基本观点进而类化,将“自我”归为某一社群,最终冠以社群的普遍特征与核心价值,同时完成从静态到动态的演变路径。

认知途径和方式的选取以及实行的过程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是社会类别在某一环

境下的记忆是否容易被提取。社会类别越高表明其可操作性越高,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其二在于特定时间的对比能否准确地描述,只有描述准确的客观群际才能成为类化和比较的基础。其三是能否适当地描述行为主体在参与期望度上的差异性,对于期望度的描述越符合行为主体的需求则被采取的可能性越高。除此之外,认同结果还会受到系统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虽非系统的内生因素也并非决定性因素,但对于结果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 三、台湾社会认同的演变路径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台湾民众认同的基础是作为一个地域关系为主的共同体(社会群体)而形成的。自明郑时期至清代,因多次的移民潮台湾逐渐成为以汉族为主的移民社会,并随之产生以“乡土意识”为核心的本土认同,但这种“乡土认同”只是纯粹的地方性认同,并不涉及“国家认同”的内容<sup>[4]</sup>。刘国深教授认为由“乡土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变迁起点是1895年,根源于日本的“认同虚像”以及台湾民众自行建立的“台湾民主国”虚像,是被异化的“国家图像”,最终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断裂和错位<sup>[5]</sup>。

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削弱台湾民众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降低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事实上虽然这一阶段台湾认同开始萌芽,但社会中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从本质上并未发生明显地分化。在台湾光复后国民党统治初期,极力恢复中国认同,但因其吏治腐败、军纪涣散等原因,旋即在1947年2月28日爆发“二·二八”事件成为推动台湾认同再次爆发的原动力。残酷的杀戮使得具有家国情怀的士绅数量锐减,也为日后家国认同的断裂埋下隐患。1986年因“美丽岛事件”名声大噪的党外运动因民进党的组建而构建起政党归属,同年蒋经国迫于压力开启台湾民主化进程,同时也为台湾认同的形成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通过诸如修改教科书、毁铜像等一系列的“正名”运动去除逐渐式微的中国(国家)认同的符号,使台湾认同最终形成,与中国认同、双重认同相互融合,此消彼长。

表1 台湾民众社会认同的演变路径<sup>[6]</sup>

| 年份          | 历史时期、重大事件  | 认同阶段                   |
|-------------|--|------------------------|
| 春秋、汉代~1662年 | 原住民形成,大陆移民陆续登岛   | 原住民、汉族民族文化认同冲突、融合时期    |
| 1662年~1682年 | 郑氏统治时期   | 民族文化认同                 |
| 1683年~1894年 | 清政府统治时期  | 大清帝国(中国)认同             |
| 1895年~1944年 | 日本殖民化运动,台湾社会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   | 台湾认同萌芽                 |
| 1945年~1946年 | 国民党统治初期,宣传中国认同   | 中国认同短暂恢复               |
| 1947年~1985年 | 1947年二·二八事件<br>1979年美岛事件   | 台湾认同受到激发               |
| 1986年       |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br>1986年10月5日国民党中全会蒋经国启动台湾民主化进程                                  | 台湾认同形成的社会政治基础          |
| 1987年~2008年 | 1990年民进党四全二次会议,通过了“台湾事实主权独立案”<br>1991年民进党五全大会,通过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案”<br>2000年民进党执政 | 台湾认同形成,与中国认同、双重认同相互融合。 |
| 2008年至今     | 2008年国民党再次执政   | 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分化严重          |

资料来源:根据赵建桥、方旭红(2012)《海峡两岸旅游对中国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影响研究》中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 四、两岸经济关系与台湾社会认同困境的原因分析

从认同主体的角度看,虽然1895年成为台湾民众认同异化变迁的起点,但真正使台湾社会省籍矛盾激化,台湾认同被激发则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后,而其深远的影响也在于摧毁了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动摇了国族认同的社会基础,为日后台湾社会民众认同的错位和断裂埋下历史的祸患。另一方面,当前台湾社会人口增长率较低呈现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但社会人口结构仍以“年轻世代”(通常指年龄在15~45岁之间)为主,这一社群中的年长者多出生于台湾社会民主化初期,其成长中经历台湾社会民主化的蜕变过程;而较年轻者则多在民进党推行“去中国化”中接受教育,借由修改后的历史教科书的影响逐步形成所谓“一边一国”等认识,造成了极大的家国认同危机<sup>[7]</sup>。基于相关民调结果和统计数据计算“年轻世代”与“台湾人”认同增长率的相关性系数为0.45,这一结果表明两者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虽然相关性并非极高,但其趋势性同样不容忽视。此外认同主体更易受到被动因素的影响,诸如“太阳花学运”等相关社会性事件的发生,其中的多数参与者并非真的了解运动的目的,只是在周围人的影响下而加入,这种“我群”的选择方式也成为干扰认同客观性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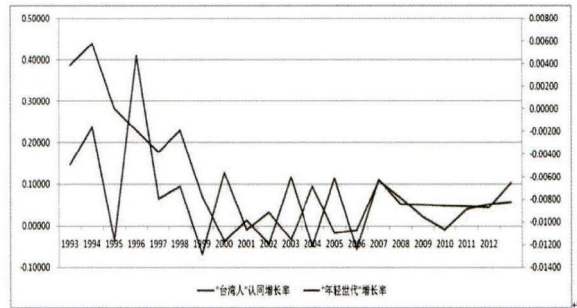


图2 “台湾人”认同增长率与“年轻世代”增长率相关性

从认同过程的角度看,如上文所述认同过程中通过比较、类比和认同三种方式进行,因此相对于台湾民众的社会认同,其会随着岛内、大陆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岛内因素较为复杂三种效用都存在,大陆因素更多地产生比较效应而国际因素则更多地为类比和认同效应。从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来看,“台独”势力的相对壮大,进而有计划、系统性地修改民众的社会记忆,并且利用民众健康的认同心理借助本土化、民主化浪潮,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家国认同,使其对于构建出的“国家”镜像高度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片面、失真的新闻报道,甚至“妖魔化”大陆社会,使台湾民众在比较效应作用下产生排斥心理,进而干扰民众建立起理性的社会认同。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大陆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相较于台湾岛内经济的低速迟缓,使台湾民众的优越感遭受严重的冲击,反而产生自信心不断膨胀,固守曾经的经济辉煌。此外,随着两岸间的交流密切,陆资入台、陆生入台以及陆客人台在为台湾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之余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负面效应。不了解可能是不认同的根源,但了解不必然会趋向认同,陆客和陆生之中不排除存在公民素质的差异,其中一些人的行为观念与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有时这些个体行为的小概率事件则会无限地催生台湾民众对大陆民众社群的不良印象,这些原因驱使台湾民众逐渐降低对于“中国人”的认同。

最后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日本因素对台湾民众的认同也存在相当的影响。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无论是在器物上的效仿,还是在习惯上的沿袭,均成功地将日本的核心价值深植于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美国则是在二战后长期插

手台湾问题,经常以“台湾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并且台湾在军事、经济等方面一直对美国存在依赖性,其中多数的社会精英都具有留美背景,现行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多受到美国的影响。美日两国的长期渗透,也使得台湾民众习惯于将这两国民众的特征冠于自己的社群,借由类比与认同的方式逐渐远离“中国人”的认同。

从认同客体的角度看,在实际的认同过程中家国认同通常是通过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认同构建的,因而经济认同、政治认同等是具体的表征,家国认同则是最终的抽象结果。两岸经济交流自签订ECFA以来有着长足的发展,在贸易动态效应上,两岸贸易往来的增加带动相关产业结构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淘汰了落后产业,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形成产业上的规模经济,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早期两岸经济交流的形式多为单向的台商投资大陆,其驱动力在于赴大陆寻求更为低廉的生产要素,这也决定了在大陆的台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出口贸易。但随大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台资企业纷纷转变发展目标由短期目标向长期目标过渡,相伴于大陆相关企业的壮大,两岸企业的互补性减弱而逐步转化为以科技创新和产品开发为基础的竞争合作关系,造成两岸同质性企业的竞争加剧。经济表征由合作转变为竞争性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在心理认同上的分化,成为困境产生的一个原因<sup>[4]</sup>。另一方面,两岸签署ECFA等相关协议也标志着两岸经济一体化走向制度性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高度发展的表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根据其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前者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其发展源于成员国(地区)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后者则是指以一定的国际协定和组织形式为框架的一体化,两者互为因果。因此说,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而制度性一体化则是功能性一体化加深的保障<sup>[5]</sup>。所以制度性一体化的推进是有条件的,在两岸经贸关系功能性一体化程度尚不确定之时大力推进制度性一体化,一则成为岛内政治倾轧的根据,二则也成为民众认同的困扰因素。

## 五、结论

其一,两岸经济关系的密切不必然导致经济认同产生,也不必然会增加台湾社会民众对于“中国人”的认同。由经济表征演变为最终抽象的趋同性认同是长期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此只有更深入地共享经济福利,力求扩大福利的受众范围,降低岛内贫富分化,让更多的民众享有发展红利,才能为认同的趋同奠定基础。

其二,本质上台湾社会民众认同具有历史性,并且易随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迁,现实情况的变更带来许多新的挑战。近期的“九合一选举”也暴露出两岸关系中的积弊,加之两岸企业的关系由过去的单纯合作逐步演变为竞争性合作,如何降低只愿在经济上、文化上建立联系,并由协商提高主体性权益的心理,如何选择合作的机制共同开拓市场也成为未来思考与研究的重要方向。

其三,从社会认同机制看,在认同的过程中要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有时又会对认同的结果产生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如何消除或者降低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程度也成为今后研究中需要开拓的主要方向。

## 参考文献:

- [1]陈孔立.台湾民意的三个层次[J].台湾研究集刊,2012(01).
- [2]余克礼.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须正视台湾认同危机[J].统一战线论坛,2011(02).
- [3]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社会学研究,2005(05).
- [4]陈孔立.自尊需求与“台湾人认同”[J].台湾研究集刊,2012(02).
- [5]刘国深.试论百年来“台湾认同”的异化问题[J].台湾研究集刊,1995(Z1).
- [6]赵建桥,方旭红.海峡两岸旅游对中国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影响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05).
- [7]郭艳.台湾“年轻世代”国家认同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J].台湾研究,2011(03).
- [8]严志兰.台湾民众认同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以大陆台商社会认同的实证研究为例[J].东南学术,2014(01).
- [9]张幼文等.2008.世界经济——原理与方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映奇